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东道国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中美贸易视角

郭家琳¹, 李颖明²

(1. 首都经贸大学, 北京 100026; 2. 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中美关系的焦点集中在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维系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尤为重要。从中美实际情况的角度出发,探讨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路径。利用2011—2016年中国7个制造业代表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在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工资水平也对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对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这三大类直接投资回归发现,消费品行业美国的直接投资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有所下降,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才是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根本。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当下中美之间贸易形势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利用直接投资对我贸易改善的积极建议。

关键词:中美经贸;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6.12;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8)09-0083-07

中美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虽然所经历的历史不长,然而却发展迅速,特别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不断攀升,到2015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随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摩擦程度也日益明显,其中,最大的争议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美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中国对其出口投资限制造成差额的增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数据指出中国相对于美国有着较高的FDI限制指数,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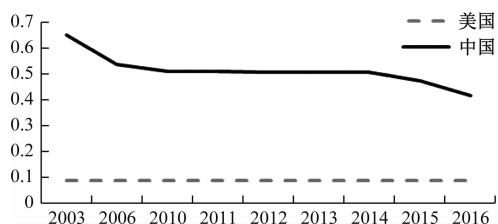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之间直接投资限制指数对比

基于此,美国政府的各种反制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交替使用,

轮番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大量废除奥巴马政府的贸易政策遗产。在竞选过程中一度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就当下美国对外较大贸易逆差的情形,计划对中国与墨西哥提高进口关税,以达到其“保护”目的。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议,并表示将重谈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做法引起了全球各界,特别地,中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担心中美贸易之争将对自身及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转型期。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淡去,劳动成本的上升,工厂逐渐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一些传统制造业开始面临倒闭的风险;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推出的时间相对滞后,不能及时响应市场动态变化的需求,造成行业发展的低迷;中国制造业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率自2010年以来在逐年下降,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竞争力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如图2所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实施以振兴制造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特征的“再

收稿日期:2018-06-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241)。

作者简介:郭家琳(1997—),女,北京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实验班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李颖明(1978—),女,河北保定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绿色转型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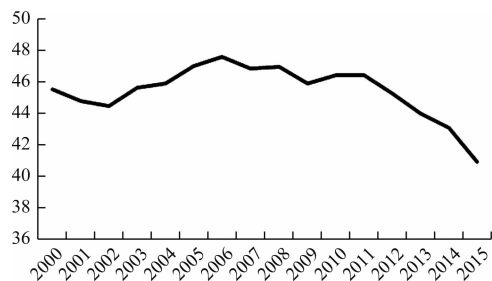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当下制造业贡献率与之前的对比

工业化”战略,并推出“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结合,与服务融合,追求效率与品质。上述发展情境给转型中的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如果不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当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供给与需求间的不平衡问题,产品质量的升级从供给的角度解决了人们的需求,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出,经济贸易通过合理地分工实现了不同主体的优势互补,是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1]。针对当下中美间的贸易问题,探究中美间 FDI 产生的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对产品的质量影响的路径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有效的利用直接投资,推动中国产品质量升级。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许多学者对 FDI 与贸易之间的流动进行了研究。彭斯达、潘黎^[2]对 1970—2003 年美国 FDI 流入总额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直接投资流入对服务贸易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Li、Moshirian & Sim^[3]的研究表明,FDI 与金融服务贸易呈现出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Moshirian^[4]认为,在发达国家中,FDI 是金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直接投资能促发展中国家与进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姚战琪和方慧、李建萍^[5-6]的研究显示,随着金融服务业的直接投资的增加,金融服务贸易也会增加。关于产品质量层面,学术界主要通过两种测算方法来实现,Michaely^[7]提出通过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来测算产品质量,即用一国中某行业的一种产品的出口总额占世界该种产品的出口总额的比重乘以该国人均 GDP 来算出。Michaely 的方法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认为一国应该出口其要素密集型产品,然而,这里的假设条件是大国,因此,这种方法存在低估出口小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Hausmannet(2006)提出构建新的产品质量测度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方式为用一种产品在一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值

占对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份额作为权数来克服这一偏差^[8]。在 FDI 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影响方面,Chen & Swenson^[9]利用中国 1997—2003 年各行业产品的贸易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跨国企业对国内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行业内 FDI 渗透率增加有利于提高内资企业的出口单位价值和出口交易量。

综上所述,FDI 与贸易之间的流动进行了研究都是出于 FDI 对各大类贸易总量的影响或关系,并没有具体到质的层面;关于产品质量测算法都是假定各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是相同的。为此,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本文结合中美两国现实国情与贸易现状,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角度,考虑了两国之间的技术、人力资本制度方面的差异,探究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1 理论分析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可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两个维度来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其中,直接效应是指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带来资本支持,包括高新技术产品的转移以及先进设备的转移,直接到中国投资生产并出口,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给出了,创新国家与模仿国家各自的产品生产和消费曲线,产品最早由创新型国家生产、购买,逐渐的销往其他国家;同时,由于第二国家具有较低的劳动成本,便在第二国家投资设厂,于是第二国家开始生产该产品,利用自己国家的低价优势,在国际上出口,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最初,中国通过这种低成本优势来吸引美国的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产品质量,起到了扩大出口的作用。然而,近几年来由于东南亚国家劳动成本更低,中国开始失去比较优势,于是美国开始减少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同时期的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的 GDP 贡献率从 2010 年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确实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表示直接投资后,外资企业对其他企业也产生了影响,可以分成产业内溢出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两种。产业内溢出效应指的是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产业后,对该产业的其他企业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外资企业有着更有效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方式,从而拥有很强的竞争力,这影响着内资企业去模仿学习产生示范效应,吸取其可以借鉴之处,利用所学来追赶与外资企业的差距。此外,外资新技术的引入本身就带有产品质量优势,倘若通过价格竞争,会抢占市场中的产品份额。

因此,为了保持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迫使中国同行企业采用更高的生产效率方式和管理办法,提高产品质量与更新换代速度,同时,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与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也会在同行业流动,人员的流动会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技术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因此,这表明着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最终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升级,对中国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是通过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与当地供应商产生的。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国来说有着较高要求与标准,对供应产品一般也会有着特殊要求。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外企会对供应商提供生产建设帮助,提供创新能力的技术协助与帮助,也会提供一些必要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此外,外商还会提供管理和组织培训,提高供应商的生产效率。在外商的带动下,相关供应商无形之中提高了自身的产品质量。

虽然直接投资会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带来积极影响,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使得两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让积极影响被削弱。在直接投资方面,双方都存在着种种现实约束,无法完全自由贸易,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限制都来自于各国的制度障碍,属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布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双方政府的一场博弈。中美双方的挑战,通常先由一方单方面设置限制,另一方抱怨、威胁,或实行相应的报复措施。如果两国不去进行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则会形成囚徒困境的博弈局面。假定对外商投资给予较低限制会促进贸易来往,用 L 表示;对投资较高的限制,则会抑制经贸来往,用 H 表示。在中美两国都选择较低限制时,分别获取的收益为 G1,G2;在中方选择较高限制时,中美两国的收益分别是 G1+,B2-(同理反之);在中美两国都选择较高限制时,所获取的收益为分别为 B1,B2。其中 G1+>G1>B1>B1-(对于 2 同成立)。

显然,若双方不进行贸易谈判,则都会选择较高的投资限制,将使双方的收益都受损失,但是,中美贸易之间的博弈不是几次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实中的博弈应该从长远角度出发,只有双方都保证在 L1,L2 条件下,才能长久获益。一国选择进行较低的投资限制,另一国施行较高的限制,则在下一次制度制定中,又会选择较高的限制以保证自己国家的利益,形成“冷酷战略”。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贸易谈判去推进双方选择较低的贸易限制。博弈理论认为成

本低廉的事前协商不一定能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也不一定被双方遵守,那么,该如何让双方信守承诺进行较低限制的贸易选择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现实中,我们还需要外界其他力量的束缚,如政治军事战略的制约,多边贸易中其他国家的约束,这些条条框框都可以维持协议,使得承诺可信。

表 1 中美之间直接投资限制的博弈模型

	美国		
	策略	L2	H2
中国	L1	G1,G2+	B1-,G2+
	H1	G1+,B2-	B1,B2

2 计量模型构建及分析

2.1 模型建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参考 Harding & Javorcik^[10]的方法,结合中美国贸易实际情形进行了适当调整,设定模型如下:

$$\ln EQ_{kt} = \alpha_0 + \alpha_1 FDI_{kt} + \alpha_2 \ln WAGE_{kt} + \alpha_3 \ln K_{kt} + \varphi_1 \ln EQ_{kt-1} + \epsilon_{kt}$$

EQ_{kt} 表示中国对美国第 k 行业 t 年的出口单位产品价值,用来衡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即单位千克或数目出口产品的价值。在微观机制中,该价格表示厂商愿意供给的以及消费者愿意且能够支付的价格。较高的出口单位价格代表着较高的支付意愿,这是由于消费者认为该产品是具有较高质量水平的垂直差异化产品。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涵盖了很多因素,是产品质量的主要体现,产品若有着较高的耐用性,即较长的使用生命期限,其产品价格会提高;若拥有较好的加工技术以及较好的实用性,会收到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品价格也会提高;此外健全的产品服务也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热衷程度。Hummels & Klenow 认为^[11]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的变化可以很好的解释贸易深度边际,而这里的贸易深度边际指的就是产品的质量。因此通过上述分析,采用下列式子衡量行业的出口单位价值:

$$EQ_{kt} = \frac{\sum_{j,t} \frac{T_{kjt}}{\sum_{j,t} T_{kjt}} \frac{T_{kjt}}{Q_{kjt}}}{\sum_{j,t} T_{kjt}}$$

T_{kjt} 表示在第 t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第 k 行业中第 j 种产品的价值总额, $\sum_{j,t} T_{kjt}$ 表示所统计量中,第 t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第 k 行业的总额。 $\frac{T_{kjt}}{\sum_{j,t} T_{kjt}}$ 表示第 k 行业中第 j 种产品在第 t 年占行业出口总份额的百

分比, $\frac{T_{kjt}}{Q_{kjt}}$ 代表 k 行业中第 j 中产品的平均价格。两项相乘再求和即得到 k 行业的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通过对各个产品的单位价值进行按出口份额加附权重,使得出口产品单位价格更能反映产品质量的真实情况。

FDI_{kt} 是第 t 年外商投资额占 k 行业的百分比,用各大行业美国直接投资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总额的比重表示,该变量主要衡量本行业外资的进入程度,称为直接投资渗透率。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美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如果美国投资企业在该行业中出口的比重增加,会提高该行业对美国产品的出口平均质量。同时,它们还会通过溢出效应,通过人员间的交流以及技术和管理方式模仿,使得其他行业产品质量的提高。

$WAGE_{kt}$ 是第 k 行业在第 t 年的人均工资,在这里使用各行业在岗职工的人均工资衡量,较高的工资会吸引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从而提高产量。从另一角度来说,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会随着人力资本禀赋的增加而增加,行业的人均工资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平均工资高的行业能吸引掌握高技能和高质量的工人的进入,这会提高该行业的人力资本禀赋程度,进而带动该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行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K_{kt} 表示在第 t 年,第 k 行业的研发经费占该行业总产值的比值。Schott 在文章中表示,除了人力资本的禀赋程度会产生影响,出口的单位价值会随着资本的密集度增加而增加,资本密集度越高,其生产产品的机器设备会容易更加先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或者生产出差异化产品,促进产品质量的升级。研发经费的投入是资本密集性的体现,为此,我们用研发经费产值比来体现资本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EQ_{kt-1} 表示中国对美国第 t-1 年 k 行业的出口单位价值。在上文分析中我们得知,中美之间对直接投资的限制是一种动态博弈。倘若去年中国加大了对直接投资的限制,这会影响到当年的出口的单位价格;而在第二年,若没有相关实质性的谈判,美国也会根据去年中国的贸易举措反过来加大对中国的限制,使得今年的单位价值进一步恶化。因此,上一时期的单位价值对下一时期的出口单位价值会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上一时期的产品质量会对下一时期的产品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2.2 数据收集处理

本文集中选取 2011—2016 年的相关数据来研究,这些数据更能解释当下贸易问题。基于 SITC7 分类,选取中国七大制造业行业的数据作为分析的样本。出口的单位价值需要知道各行业中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与出口数量,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统计库,选取七大行业中占主导份额的产品,通过上述计算方式得出每种产品的出口单价,计算结果的单位为美元。人均工资的数据来源于 2011—2016 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研发经费投入的数据来源于 2011—2016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选取对应产品的相应数据,由于单位是人民币,依据中美 2011—2016 年中美汇率选取统计年鉴结算季度的汇率作为依据,将结果转化为美元。FDI 投资渗透率来源于 2011—2016 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模型中价值单位均为美元。对数据进行相关程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图 3 与表 2 的显示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当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出与去年出口产品质量、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人均工资呈正相关的关系,并且与直接投资的相关程度较高。因此满足建模条件,可以对数据参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对各自变量进行相关系测算,其结果如下,其中 EQ1 代表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质量,EQ 代表当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表 2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

	EQ	LnEQ1	FDI	LnK	LnWAGE
EQ	1	0.27	0.29	0.32	0.22
LnEQ1	0.27	1	-0.41	0.01	0.07
FDI	0.39	-0.41	1	0.27	-0.03
LnK	0.32	0.01	0.27	1	0.91
LnWAGE	0.22	0.07	-0.03	0.91	1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总体行业分析

对样本总体数据进行建模,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总体行业回归结果

	估计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截距	-6.51	2.60	-2.50	0.013 9*
LnEQ1	0.25	0.10	2.59	0.001**
FDI	0.61	0.28	2.18	0.001 3**
LnK	1.16	0.43	2.71	0.007 8**
LnWAGE	5.35	1.22	4.38	0.01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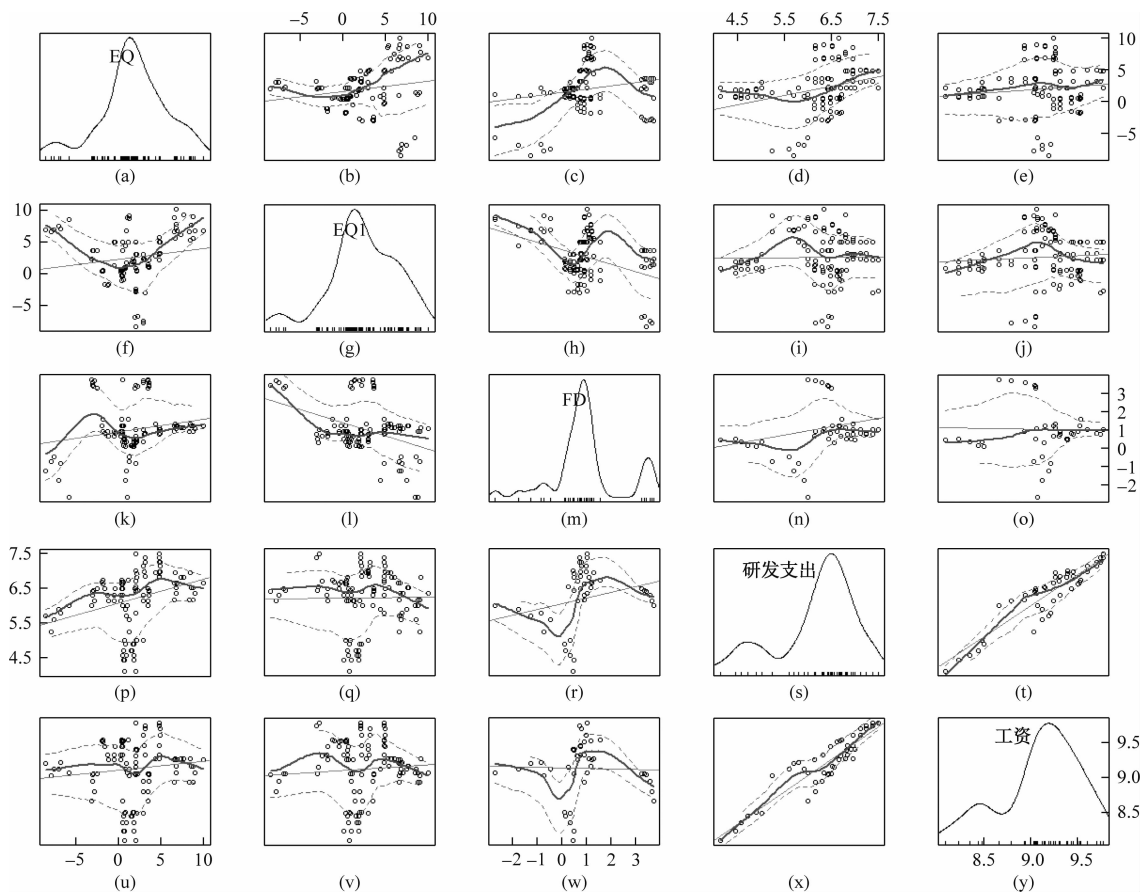


图 3 各变量相互关系散点图

通过计量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各个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渗透率可以较显著的提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单位价格，即对产品的质量有积极的影响。直接投资渗透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总体的出口单位价格会增加 0.614 5 个单位，这与前面的我们所分析的预期相符。外资企业进入会从资本、技术水平、高端人才涌入这些方面来提高产品价值，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从广延边际的角度来解释，即外商企业由于较高的产品价格定位对同行业甚至其他行业的厂商会产生影响，同时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对于美国的经济水平来说，其居民对高质量的产品有着较大的需求弹性，所产生的价格变化会产生较大的需求量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厂商受价格变化，提供的产量也做出相应的调整，中国各行业受外资进入示范效应的影响，学习外商的先进之处，提高本土行业的技术水平与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产品质量。

相较于其他参数，行业的研发投入这一影响因素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有着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人均工资与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平均价值呈正相关，增加一单位的人均工资，出口产品的平均价值相应的增加

5.354 个单位，这意味着高薪资对人才的吸引效果显著。通过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才进入，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产品水平，但是估计出来的参数并没有像其他参数那样有较强的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时滞效应造成的。

3.2 最终产品分析

全部国际贸易商品被分为 7 大类，针对这些商品，按最终用途汇总又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三个门类。按这三大类分组回归结果如下：

表 4 分行业回归结果

	中间品	资本品	消费品
截距	77.353 8 (4.75e-05***)	-63.971 3 (0.013 82*)	72.775 9 (0.128 82)
LnEQ1	0.322 5 (0.017 6*)	-0.208 11 (0.009 38**)	0.625 9 (0.005 42**)
FDI	0.520 9 (0.066 0)	-0.701 85 (0.048 78*)	-2.503 2 (0.063 54)
LnK	7.826 (6.68e-06***)	6.204 35 (0.149 17)	4.826 6 (0.091 24)
LnWAGE	-3.713 4 (6.99e-06***)	11.775 2 (0.038 38*)	-1.229 8 (0.118 13)

注：括号内为各个系数的 p 值以及显著程度。

从各个变量的角度来看,对于用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中间品以及消费品,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呈正面影响,显著度并不是很高。资本品质量的提高受直接投资的影响较显著,但是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研发投入中间品与资本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比消费品的效果更显著,但是平均工资的提高对中间产品与消费品的质量提高产生着负作用。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资本密集产业的投资,并不会产生产品质量的提高,技术外溢程度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出于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或是其他政策优势的原因,才对中国进行投资。在整个投资、生产的过程中,美国企业对其产业核心机密有着较强的保护意识,与同行业形成了较强的进入壁垒,造成并没有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积极影响。因为中国自身在知识产权维护方面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与美国相比,知识产权资金投入程度有很大的差距,使得美国对中国产生不信任。而对于中间品与消费品,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技术差异,于是美国并不会采取特意保护,加强行业间的交流,进而影响着产品的质量。

从三大类行业的角度来说,研发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使企业在本质上发生改变,而平均工资的提高会影响着生产效率,是企业产量的变化。模型结果中显示,研发支出对资本品质量的提高乘数效应更大,但是参数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在人均工资方面,消费品行业人均工资的提高反而会对产品的质量有负影响。要素投入对各三大类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反映出中国对于不同行业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进行供给侧改革。具体说明,中国在资本品研发投入的落实上并不到位。这种不到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指的是投入资金量不够,另一方面存在资金利用效率的问题。在人力资本方面,由于我已经开始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的转变,因而工资的增加带来的效应远小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应,中国企业导向应该转向技术水平的推进。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美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不是单一的促进关系,涉及到不同的行业类别,会有不同的影响因素。FDI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工资水平也对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对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这三大类直接投资回归发现,消费品行业美国的直接投资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有所下降,这与中国的内部国情以及国际

局势是分不开的。中国应首要解决国家内部的改革问题,注重品质的提升,配套法律措施的完善,监管的严格。同时,中国应密切关注与美国即将进行的“百日计划”,以及双边贸易的推进,希望能对贸易目标达成共识,解除障碍。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提议需要进一步发挥领导能力,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欢迎美国加入进去,增强两国间的合作。最后,中国仍需加强对WTO规则的认识,在面对可能发生的不公平贸易待遇时,做好诉讼的准备;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工作,与欧盟、金砖国家等建立同盟,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

4.2 政策建议

1)推行供给侧改革,提升企业竞争力。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从上面建模结果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在传统行业优势转弱,是因为缺少创新以及创新的效率。在创新的驱动下,提升产品品质,向美国的标准靠拢,这有助于达成合作的稳定与一致,而这些属于供给侧。因此,中国当下应着力推行供给侧改革,提升企业竞争力。一方面,政府应当给予创新企业更多支持。在税收方面进行优惠,减税免税或者贷款优惠。另一方面,企业应该认识到,在创新方面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智能方面,还要注意到绿色产品,注重可持续性发展,这亦是一种创新。日本、欧洲和北美的顾客越来越偏爱绿色产品;随着中国收入的提高,中国消费者也对绿色、健康产品的呼声高涨。“阿里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购买绿色产品的活跃用户,从2011年的43万增加到了2015年的6500万。面对较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推动绿色化则将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中的名誉和竞争力。这也符合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从供给侧入手,不断努力满足人们的需求,是中国解决内部矛盾的一条有效途径。

2)落实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美国在过去只和两个国家即乌拉圭和卢旺达达成了双边投资协定,这是由于,美国对双边贸易协定的要求苛刻,很难与其他国家达成一致的标准。并且即使达成,收益并不明显。不过,特朗普上任以来的迹象表明出了美国将要开展双边贸易协定。在上台初便退出了TPP,于今年五月份,已经与英国就双边贸易协议进行过讨论。中国与许多国家达成过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然而并未与美国达成任何贸易协定。不过,从2008年,与美国已经开始了磋商。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美国企业高呼期待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并进行了多轮协商。但是协定中就负面清单谈判有许多分歧,仍需要长时间的磨合,进一步努力。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中美

双方都表示出积极合作的态度,美方还发起了“百日计划”的贸易谈判,这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面对当下的机会,中方应当先让步,让美方看到收益。中方可以放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对自己本国一些政府补贴项目进行自我检查;并且,在法律方面,建立更加详尽完备的知识产权体制,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这对美国以及中国都是有利处的。同时,在谈判中,中国需要重点将CFIUS纳入谈判范本,因为即使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需要接受审查,会使谈判带来的效果减弱。因此,我们希望美方的审查制度标准具体规范,这样清晰的条文框架可以减少双方的摩擦。另外,WTO框架没有明确规定成员方在自贸协定中应如何适用《WTO反倾销协定》。从全球已经签订并实施的自贸协定看,自贸协定完全有可能实现协定双方限制乃至互不适用反倾销政策。中国需要借此机会对中国关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等重要政策有确定性的进展。

3) 多边贸易合作。BIT要求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才可以成为法案,这是十分困难的。双方政治上的障碍可能会使双边贸易协定进行的进程慢、周期长。因此加强经贸关系,还可以通过多边贸易合作来推进。当下中国大力推出“一带一路”方针,促进各国在合作中受益,中方也欢迎美方加入“一带一路”的合作队伍中去。由于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许多国家逐渐形成关系日趋紧密的贸易网络,这更加凸显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性。在合作中,可以使美国增加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美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这也有助于解决美国内部财务问题。同时,中美两个国家都是APEC成员,是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

基础。APEC领导人在1994年11月的茂物宣言中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这也是亚太自贸区进行建设的目标。多边贸易合作为双边贸易协定打下基础,这有助于推进BIT的落实。

参考文献

- [1] 李杨,黄艳希.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基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0):114—136,159—160.
- [2] 彭斯达,潘黎.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6(3):67—72.
- [3] MOSHIRIAN F, LI D, SIM A B. 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 Finance, 2005, 24(7): 1090—1107.
- [4] MOSHIRIAN F. Financial services in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8, 32(11): 2288—2292.
- [5] 姚战琪.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及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06(6):38—44.
- [6] 方慧,李建萍,FDI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08(2):54—57.
- [7] WILLIAM J RIEBER. Trade, income levels, and dependence, by michael michaely[M]. 1984.
- [8] HAUSMAN E, FAGAN R, WHITE D, et al. LMP electricity markets: market operations, market power, and value for consumers[D]. 2006.
- [9] CHEN, DL SWENSO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new chinese export transactions[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January, 2006.
- [10] TORFINN HARDING, BEATA S JAVORCIK.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and they will come: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FDI inflow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1, 121(557): 1445—1476.
- [11] HUMMELS D, KLENOW P.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2): 704—723.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 Export of the Host Country?

——Based on China-US trade perspective

GUO Jia-lin¹, LI Ying-ming²

(1.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ainly focus on trad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quality of China exports. Based on the recent China-US trade sit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icro-path of the impact of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quality of Chinese export products. Collecting the data of 7 manufacturing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6, we do research on the U. S. direct investment impact to the China exports qua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hinese export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s well as wage level, and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duct quality. Then, we get further study to different product categories-capital goods, intermediates and consumer goods. We found that the U. 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nsumer goods industr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What's more, due to the weakening advantages of Chines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t is urgent for us to realize that upgrading our own technology i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in improving exports qual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putting forward posi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use direct investment to improve present trade condition.

Key words: China-US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mpact path